

深度评论

# 科学缺席，“科学谣言”就会疯跑

打造破除“科学谣言”的科学体系，使真科学的种子在社会上生根发芽，不断生长蔓延，“科学谣言”生存的土壤必会越来越来少。

■廖德凯

雾霾不散是因“核雾霾”、吃一碗方便面要花32天解毒、高铁辐射严重致女性“不孕”、瓶装水暴晒后有毒不能喝……这些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它们都位列联合辟谣平台、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科技记协日前发布的2014年十大“科学谣言”之中，也就是说，这些说法都是骗人的！

这些耸人听闻、披上“科学”外衣的谣言，涉及公众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或关注的事物，给许多人造成了极大困扰，也搞乱了人们对日常科学的认知。更大的问题是，“科学谣言”远不止“十大”之数，诸如“香蕉艾滋病毒”“注射西瓜”等“有根有据”的谣言，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一个谣言就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使相关产业从业者无辜“躺枪”。笔者认为，要破除“科学谣言”，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强大力量进行打击。

“科学谣言”的可怕、可恶之处，在于其披着“科学”外衣。很多普通人科学素

养不足，辨别能力有限，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避害思维，甚少刨根问底，追问究竟。而公众的恐慌心理、从众心理和心理定势，正是“科学谣言”的传播温床，借助互联网强大的聚合、放大效应，“科学谣言”容易迅速爆炸性传播、病毒式感染。

根据“科学谣言”形成和传播扩散的特点，要对其进行抑制和消除，必须社会上形成科学的对抗系统。具体来说，应当形成学校加强科学教育、公民提升科学素养、专家及时辟谣、法律适时跟进的“四位一体”科学体系。

谣言止于“教”。学校的科学教育是抵御“科学谣言”的基础。在网络上，“科学谣言”的传播者甚至制造者中，不乏学生的身影。这说明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科学教育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学校抓好学生的科学教育，可以夯实社会抵御“科学谣言”的根基。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很信任孩子学到的知识，在科学方面愿意听取孩子的意见，当学生的科学素养得到提高时，

学生家长的科学素养也能水涨船高，“小手拉大手”能起到特殊作用。

谣言止于“智”。公民科学素养是抵御“科学谣言”的根本。“科学谣言”之所以泛滥，根本原因在于公众缺乏科学素养，缺少“想一想”的科学观念、“问一问”的科学思维，结果被谣言轻易攻破心理防线。笔者建议，应当在全社会创造浓厚的科学氛围，特别是要利用公共传播媒介，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生活中的常见科学问题进行传播，让公众逐步提高科学素养，凡事多问“为什么”，避免出现相信科学却被“科学谣言”所骗的尴尬。

谣言止于“专”。在“科学谣言”的传播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谣言发端初期，很难看到相关的权威专家出来辟谣。一些专家对很多他们眼中的简单问题不屑于进行回应，不屑于和“科学谣言”交锋，害怕“掉价”。但是，在打击“科学谣言”的行动中，专家的及时跟进、勇于担当必不可少，对付“科学谣言”，就是要用真科学进行辟谣。事实上，这是专家与公众进行直接交流，塑

造专家良好形象的契机，抓住这种为公众提供科普服务的机会，也有利于甩掉“砖家”的帽子。

谣言止于“责”。这里的“责”，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网上活动的所有人，都应当具备基本的责任意识。一些“科学谣言”的产生，可能只是某位网友无聊时的一个恶作剧，但却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网友在搞恶作剧之前，应当估量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对于其他网民特别是所谓“大V”，对于类似的“生活中的科学”，至少应当明确其来源后再进行传播。另一方面，国家法律应当及时跟进，对造成重大损失的“科学谣言”制造者，及时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完成破除“科学谣言”的最后一道程序。

总之，“科学谣言”的产生、传播和危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教育、心理等因素，根据这些因素，打造破除“科学谣言”的科学体系，使真科学的种子在社会上生根发芽，不断生长蔓延，“科学谣言”生存的土壤必会越来越来少。

(作者系公务员)

观点

## 别误读了“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

■郭立场

曾几何时，学历学位是个人发展的敲门砖，“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不用理睬，中专一边采点”，没有高学历俨然就丧失了前途。在“学历社会”的环境下，学历歧视屡见不鲜，通常认为只有拥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在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高学历甚至可以起到“一俊遮百丑”之效。然而，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的《2014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专科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到96.88%，其次为本科毕业生的96.65%，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分别为96.58%和96.20%。于是有媒体反其道而行，据此拿“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说事，似乎博士生还不如专科生吃香。

高学历崇拜固然要不得，但把专、本、硕、博等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的就业率相提并论，草率得出“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的结论，而罔顾质与量的差别，显然有失偏颇，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导向。换言之，对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数据不宜过于较真，更不能相提并论，简单地以就业率来评价优劣并不严谨，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由于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巨大差异，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往往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率相应较高，只是职业教育回归就业本位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相比本科生而言，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由于读书时间较长，前期付出较多，就业期望值也相应较高，多期望找到薪水更高、待遇更好、工作更体面的职位，面临的选择机会也较多，择业周期相应较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就业统计。

不难看出，不同学历层次之间在培养目标、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就业去向、就业质量、职业发展上亦有很大不同，即便是大数据得出的统计结果，也不能单纯以冷冰冰的数字来说话，而是要科学分析数字背后的事实真相，才能为个人选择、教育改革、社会发展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可以预见的是，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逐步推进，各领域各行业对高端顶尖人才的需求旺盛，高等教育应积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与时俱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断增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其实，在毕业年度统计就业率，即便数据真实，也未必能反映毕业生真实的就业状况，毕竟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很多，能否就业、何时就业、如何就业及就业稳定与否，并不能靠划杠杠确定下来，而是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高校毕业生绽放的青春，不能只有冷冰冰的就业率统计，而是应有更多样的选择。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系统，在传播活动中尤需重视社会责任，求真务实搞好调查研究，不能被“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假象所迷惑，更不能为了所谓的“眼球效应”而误导公众。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教师)

漫画图说

## 集体无意识比集体下跪更可悲

男儿膝下有黄金，女子膝下也不是粪土。乍一看到云南某中学一间教室门外，数位学生(以女生为主)齐刷刷跪在过道边，相信很多人都感到痛心，并严词抨击“逼迫”他们下跪之人；但随着媒体的跟进，“真相”日前被揭开：下跪的学生是因为玩游戏输了受罚。对此，笔者非但没有释然，反而感到一种更沉重的悲哀。

同学之间玩游戏，惩罚手段本应无伤大雅，是多么残酷的游戏需要以下跪作为惩罚？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据当地有关部门解释，学生们不过是在课间玩“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了的学生嘻嘻哈哈地跪在地上接受惩罚”。

即便这就是事件“真相”，学生们暴露出来的“无底线”心理也足够让我们警醒。用网络流行语来说，下跪学生可谓“节操碎了一地”，但他们貌似并不以为耻，这或许正与当下的网络语境有关，“无节操”“秀下限”在一些青少年心目中是个性、时髦的表现，暗合了他们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在这种扭曲心理的作用下，下跪这一丧失人格行为的耻辱含义被消解了，他们堕入集体无意识，这比下跪本身更可悲。

这并非个案。“白血病大学生集体下跪”“8岁男孩因犯错被罚跪”等类似新闻近几年不时出现，敲响了青少年人格教育缺失的警钟。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小学生对年幼无知，那么更应该反思的，是教师和家长：是否对孩子进行过人格教育？是否告诫过他们下跪行为的耻辱含义？自己是否就是侮辱损害孩子尊严的始作俑者？

杨国营 文 王铎 绘



# 教师可弹劾校长彰显依法治校

■徐冬青

虽然我国《学校法》还没有出台，但来自实践领域的制度创新实践却没有止步。日前，北京十一学校的学校章程引起了教育界关注，特别是章程里面以“教师弹劾校长”条款为代表的诸多条文引起了热议。这一被称为开启了该校依法治校新纪元的事件，成为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要求，到2015年全国全面形成“一校一章程”格局的一个范例。制定好学校的“大法”，成为当前学校管理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虽然十一学校的章程带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对于其他学校是否具有普适性存有争议。但仅就其本身而言，也给我们诸多启示。

通过办学章程的确定，学校的领导体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框架，改变

了我国很多学校在领导换届或变更中出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我国很多地区每隔三五年的学校校长流动给学校带来的“伤筋动骨”的影响，各种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式的学校低水平重复发展状态，追根溯源，在于学校缺少一个基本稳定的治理框架。而章程办学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这种因领导更换带来的问题，有利于积极引导学校新领导采取“叠罗汉”式的累积性发展策略，从制度层面保障学校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以来，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能落实问题一直受到关注。究其原因，除了政府放权的魄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微观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由于这一缺失，导致政府在放权时很容易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政府放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学校做什么？怎么做？如何评价做的效果？这三个方面的基

本框架要做到清楚、透明。而学校办学章程的建立，在微观自我监督机制的意义上，满足了放权的三个条件，尤其是制度层面的规范性建设，使得学校自主权有了微观监督机制的保证。权力结构配套完整，边界界定清晰，运作机制程序公正，再通过学校内部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理顺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为管、办、评分离的宏观治理变革夯实了微观组织基础。

学校实行章程办学有助于提升学校治理之境，即从原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向合作伙伴或契约关系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章程办学也就是契约办学或合同办学。章程办学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形成学校有效治理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机制保证。因此，章程办学是推动学校依法治教的一个有效载体，也是推动学校制度能力建设的有效手段，更是学校谋划长治久安，避免折腾和重复建设的有效途径。

上述几个方面也许是十一学校启动章程办学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但是，要保证章程办学不落空，学校制度能力建设是关键，而这只有在制度创新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学校制度能力建设不仅要看校长的制度意识和运作能力，也需要整个学校恪守制度规范，营造尊重规则的文化生态。这是一切制度真正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保证学校章程具有真实效力的基本条件。

今年，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一校一章程”的话，制度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匹配的制度意识和文化是否到位，是章程办学是否能够推行到位，而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的根本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十一学校的章程办学是仅具个案意义，还是具有推广价值，仍需拭目以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 “封校无比正确”逻辑无比冰冷

■顾骏

2014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外滩不幸发生游客踩踏惨剧，三十余人不幸逝去。然而，就在这全国人民为此深深哀悼之际，西安一所学院却在其官网首页刊出《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的文章，让人惊愕、愤怒之余，着实对这所大学能否教育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大学生充满疑虑。

仅看题目就让人难以接受的这篇“奇文”，是该学院对因为在平安夜封闭校门，禁止学生过圣诞节，代之以集体观看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片而受到舆论批评的回应。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后，这家学院似乎顿时来了精神，好像自家学生没有发生事故，学校就有了

在公众面前“秀”一把的资格，完全不顾全国其他学校没有在节日期间封门，也同样安全进入新一年的事实。借事故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如此缺乏人文关怀的举动，如何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

该学院认为，上海外滩踩踏惨剧发生的外部条件是“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的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发生惨剧的内在管理则是“中国的流行舆论场大都主张大学对学生的管理应当‘大撒手’，美其名曰：大学生已经成人了，让他们享受一切自由，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

该院言下之意，好像踩踏事故的发生，一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过洋节”；二不是因为对游客大规模集结的

管理不到位，而是因为大学生不受管教约束。笔者不禁要问：难道中国传统节日就没有人流集中，或者集中了也不会发生踩踏？难道没有大学生，人口就不会集中了？思维如此缺乏逻辑，只会牵强附会，在此种思维主导下，办学者如何实施合理有效的管理？

该院院先是借“弘扬传统”之名，行过度管束大学生之实，继而又借“安全”之名，为对大学生过度管束辩解；既无视大学生已经成年，有权利也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无视学校作为公共机构必须依法管理，不能超越职权随便封闭校门，限制学生行动自由，从而干预大学生对是否过节和过节方式的选择。如此缺乏法律意识，不尊重法定原则的学院，是该认真反思和检讨自身的管理方式了。

正确对待外来引进文化，主动亲近本

土文化，这本身没有问题，一所大学对此有清晰意识，也不是坏事。值得这家学院反思的是，文化问题只能用文化的方式而非采取强制措施来解决。纵观传统文化视频如果完全交由学生自主决定，那确实很“文化”，但如果要靠封门、教师现场“督阵”来进行，那高文化可就远了，大学生哪怕坐在银幕前，也可能心有旁骛，视若无睹，完全不走心。学院管理者何不组织动员大学生拿出创意，开发些贴近大学生特点和需求的传统文化活动项目，让学生更多地主动参与，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这样做不仅可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岂不皆大欢喜？总之，多用智力，少用体力；多些能力，不用蛮力，这才是一所现代化大学该有的管理风范。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 校门口安全不能总靠家长站岗

■曹灿辉

近日，山东省新泰市第一实验小学为学生开通进校的绿色通道。将近400米长的通道上，每隔几米就有一位家长执勤，绿色通道所在的马路上，没有一辆机动车在行驶，让5200多名学生上学路上有了安全保障。(1月5日《齐鲁晚报》)

随着近年来我国私家车保有量的迅猛增多，一些紧邻公路的中小学校门口经常发生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的考验，特别是每天学生上下学时，人车多，学生安全状况十分堪忧。这不仅威胁学生安全，牵动家长神经，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也给学生遵纪守法文明守规带来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开辟校门“有形”的“绿色通道”。一是交警部门在上下学时间段，增派警力，在学校门口设立专人专岗，加大对校门口周边区域的值勤力度，确保人、车有序通行。针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家长反映较强烈的路段，及时划定斑马线，设置减速带、安全提示牌和隔离护栏。也可以设立“学生专用通道”，在一定的时间内仅允许学生通行。二是教师、家长轮流值勤，协助城管等相关部门加强对上下学时校门口主要路段的管理，禁止占道设摊。三是各班级可“错峰放学”，避免家长接送学生时人流、车流过于集中。四是家长引导孩子徒步或乘公交车上下学，家长也可送孩子到校门口即走。五是强化学生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平时多练习走人行道、斑马线，不乱横穿马路，掌握应对校门口交通安全问题的基本技能。

除了“有形”的绿色通道，开辟校门“无形”的“绿色通道”也很重要。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明确责任，科学管理，在地方或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学校和其他政府相关部门对校门口交通安全秩序应承担的责任，改出了问题学校一家担责的现状。更要对其他政府相关部门对校门口交通安全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让这项工作真正进入科学化、常态化的轨道。

总之，若想彻底破解校门口交通安全秩序问题，必须同时做好校门口交通通道的具体规划管理和提高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虚”“实”结合全面推进。(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公务员)

多用智力，少用体力；多些能力，不用蛮力，这才是一所现代化大学该有的管理风范。